

# 恐怖主义的幽灵



The Specter of Terreism

白轻 编译 王玉麟 校对

# 恐怖主义的幽灵

The Specter of Terrorism

白轻 编译 校对 王玉麟

PULSASIR 浚先生

■ 一个幽灵，恐怖主义的幽灵，在全球徘徊。

---

## 目 录

|    |                      |
|----|----------------------|
| 1  | 碎片                   |
| 5  | [法]鲍德里亚：恐怖主义的假想      |
| 19 |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
| 43 | [美]罗蒂：用民主反抗恐怖        |
| 49 | [意]阿甘本：论安全与恐怖        |
| 53 | [法]巴迪欧：哲学与“反恐战争”     |
| 75 | [法]朗西埃：9·11 及之后      |
| 85 | [英]伊格尔顿：活死人          |
| 99 | [法]维利里奥：事故论证         |

碎片<sup>1</sup>

在归零地的废墟上，唯有碎片而已。

——题记

随着对纽约世贸大楼的袭击的发生，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面临的  
是一个绝对的事件，一切事件之“母”，一个在自身内部将所有从未发  
生的事件统一起来的纯粹事件。

它是关于死亡的一切，不仅是真实时间中死亡的暴力入侵，更是一个远远超过了真实的死亡入侵：一种象征的和牺牲的死亡，即绝对的、不可更改的事件。

这就是恐怖主义的幽灵。

双子塔是用自身的死亡来回应飞机的自杀式冲撞。人们曾说：“上帝无法对自己宣战。”但他可以。西方就处于上帝的位置（拥有神性的全能和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它已然步入了自我毁灭并对自身宣战。

---

1 选自“灾难三部曲”：鲍德里亚，《恐怖主义的幽灵》（*The Spirit of Terrorism*），齐泽克，《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维利里奥，《归零地》（*Ground Zero*），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正是世界，正是全球自身在抵抗全球化。

（让·鲍德里亚）

这是《现代启示录》的教训：库兹（Kurtz）的形象并非野蛮过去的残留，而是现代权力，即西方权力本身的必然产物。库兹是一个出色的士兵，而他自己通过和军事权力体系的过度认同，转而变成了体系不得不去消除的过度。《现代启示录》的终极洞见就是，权力生成了自身的过度，权力不得不亲自消灭这样的过度。

在律法的层面上，我们被当作公民，是合法的主体；而在其淫荡的超我增补，空洞的绝对律法的层面上，我们都是牲人（homo sacer）。

真实之物就是一个幻想的幽灵，它的在场确保了我们象征大厦的一致性，从而使我们得以逃避其结构的不一致性（“对抗”）。

（斯拉沃热·齐泽克）

袭击发动者的匿名性，对所有人而言，仅仅标志了一种全球的隐秘状况，一种“超善恶”的私人犯罪的未知量的降临。

进步就是加速。

一种速度学历史的加速及其冲击不再指向人类时间的乌托邦，而是人类时间的乌托时。

在启蒙的世纪后，会有一个光速的世纪，尔后，是我们的世纪，速度之光的世纪。

我们已知，速度是世界的晚期。屈从于其虚无主义，世界退缩了，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被驱逐出时间。

不再需要立体的视角。在我们面前，影像停止了滚动；对人性而言，

时间不再是一种它可以在其中运行的维度。

没有未来——没有宣传，因此也没有信仰——我们正遭受厌世症，  
一种新的绝望的折磨。

（保罗·维利里奥）





恐怖主义的假想<sup>1</sup>

[法] 让·鲍德里亚

在假想的开头，我们或许误以为，9·11 袭击只是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上的一個事件或意外而已。这是一个终将令我们感到绝望的假想，因为某件非凡的事情发生了，忽视它就等于承认，今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构成一个事件，我们注定要把全球化权力的完美逻辑演绎到底，这全球化权力能够吸纳任何的抵抗，任何的对抗，并因此而增强它自己——恐怖主义的举动正是在加速一个独一的权力和一种独一的思想方式在地球上的霸权地位的确立。

与这种零假想相对立的是最大化的假想，是为 9·11 的事件特征下最大的赌注——事件被定义为在一个普遍交换的体系内突然间创造出一个不可能之交换的领域：事件中心的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事件换取

---

<sup>1</sup> Jean Baudrillard,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tran.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Book, 2002, p.49-84.

任何话语的不可能之交换。这便是其象征性的力量。也就是这种象征性的力量在曼哈顿的事件里击中了我们所有的人。

根据零假想，恐怖主义事件是无意义的。它本不应存在，并且根本上，它就不存在。这等于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事物：恶只是一种幻象，是善之轨迹的一个偶然变化——在这里，善的轨迹就是全球秩序和幸福的全球化的轨迹。神学总要把自身建立在恶本身的这种非现实性之上。

另一种假想：它是自杀的疯子、精神病人、某种不正当理念的狂热分子做出的举动，他们受到了邪恶力量的操纵，这邪恶的力量利用被压迫者的不满和仇恨来实现其毁灭性的暴怒。同样的假想——它更讨人喜欢，试图把历史理性赋予恐怖主义——是把恐怖主义视作被压迫的人民的绝望的真实表达。但这种论证本身是可疑的，因为它谴责恐怖主义是以一种根本上无能的姿态来表现全球化的悲惨。即便我们同意恐怖主义是全球化秩序之政见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一旦我们揭示出其失败和无意识结果（它无意中强化了全球秩序），它便无法成立。这是阿伦塔蒂·罗伊（Arundhati Roy）提出的观念，他既谴责霸权，又谴责恐怖主义是它的孪生物——体系的魔鬼孪生物。那么，想象一下，如果恐怖主义不存在，体系也会把它创造出来。为什么不把9·11看成是中情局（CIA）的一个噱头呢？

再一次，这等于说一切的反抗暴力最终和现存秩序达成了共谋。行动者的意图及其行动所担负的风险，全都变得不值一提。它把行动化约为行动的“客观”后果（9·11的地缘政治学后果），不从自身力量的视角来看待行动了。那么，到底谁在玩谁？谁在玩别人的游戏？在这里，恐怖分子趁体系之便而获利，为自身谋取权力；两个敌手沿着平行的轨道赛跑，不同于阶级斗争和历史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从不真正地相

遇。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不是关于恐怖主义和世界秩序之间“客观”共谋的假想，我们应该提出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想，关于权力和反对权力的外部力量之间深刻的内在共谋的假想，关于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假想——这种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在中途遭到了恐怖主义行动暴力的侵扰。没有这种关于秘密共谋和勾结倾向的假想，我们便无法理解恐怖主义，无法理解克服恐怖主义的不可能性。

如果恐怖主义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在正面的交锋中破坏全球秩序，那么，它就不免显得荒唐：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力量关系都是如此地不平等，而全球秩序早已是无以复加的混乱和反常的所在了。在这额外的混乱下，一个人甚至要冒着警察和安全控制体系不断强化的风险去行动，就像我们在各方所见到的那样。

或许，这才是恐怖主义的梦想 一个永恒的敌人。如果敌人不复存在，要摧毁它就愈发地困难。一个恒真式，无疑，恐怖主义是恒真的，而它的结论是一个矛盾的三段论：如果国家真的存在，它会把一种政治意义赋予恐怖主义。既然恐怖主义没有政治意义（尽管它有其他的意义），这就证明：国家不存在，国家的权力也是可笑的。

那么，恐怖主义的秘密讯息是什么？在一则阿凡提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他每天骑着驴，背着麻袋穿越边境。每当麻袋被检查的时候，里头什么也没有。于是，阿凡提继续骑着驴穿越边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他到底在走私什么。阿凡提回答说：“我在走私驴。”

同样地，我们会怀疑，在恐怖主义行动的所有表面性动机（宗教、殉道、复仇或策略）背后，被走私的到底是什么？很简单，通过貌似自杀的举动，他们完成了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死亡的象征性礼物来对

体系发起挑战，死亡的礼物就是一个绝对的武器（双子塔似乎领会了这点，因为它们用自身的崩塌来回应）。

这是统治的假想：恐怖主义最终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无法被其“真实”的政治和历史结果所度量。而矛盾的是，正因为它没有意义，它在一个持续浸透着意义和效能的世界中构成了一个事件。

统治的假想认为，恐怖主义在其引人注目的暴力，在伊斯兰和美国之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心的一种根本对抗而出现了，它是一种力量，无法被化约为对世界的一种必要的技术与精神实现，也无法被化约为走向全球化既定秩序的不可逆转的运动。

一种与体系的死亡力量扭斗在一起的反作用力。这力量抵抗着一种完全溶于循环或交换的全球性。一种不可化约的独一性的力量，随着体系施展霸权，它变得愈发地暴力——直至9·11这样的断裂性事件：9·11不解决对抗，而是在象征性的维度上，助了它一臂之力。

恐怖主义并没有发明什么，也没有开创什么。它只是将事物带向极端，带向爆发点。它加剧了事物的某一状况，加剧了某种暴力和不确定性的逻辑。体系自身通过一切交换的投机性扩张，通过它四处强加的随机而虚拟的形式——高效的生产，漂移的资本，强制的流动性和加速度——制造了一种普遍盛行的不确定性原则，而恐怖主义把这一原则简单地转译为彻底的不安全性。恐怖主义是非真实的和非现实的？但我们虚拟的现实，我们信息和交流的体系也是如此，长久以来，它早已超越了现实性原则。就恐怖而言，我们知道它已经无处不在了，在体制化的暴力（精神的和肉体的暴力）中，在顺势疗法的行动中。恐怖主义只是让所有悬浮的因子结晶。它把最后一击投向了双子塔所代表的权力、解放、流动和算计的狂欢，并在同时暴力地摧毁了效率和霸权的极端形式。

所以，在全球权力的废墟和瓦砾上，我们只能绝望地发觉自身的形象。

实际上，我们从废墟中看不见任何东西——就连仇视一个无形敌人的符号也找不到。在这里流露的只有美国人民对自身的巨大怜悯——星条旗，纪念信息，对遇难者和后现代英雄（消防员，警察）的狂热崇拜。这种怜悯是那些想要和上帝独自在一起的人们的民族激情，他们宁愿看到自身被上帝而不是邪恶的权力所击败。“上帝保佑美国”变成了“最终，上帝击败了我们”。他们惊慌失措，但最终还要对这种使我们沦为祭品的神性关怀抱以永恒的感激。

道德意识的推理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善，那么，击败我们的就只有恶。但对那些自视为善之化身的人来说，如果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击败他们的就只有上帝。如若不是因为德性和权力的过度，不是因为善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所代表的过度，他们又因何遭受惩罚？他们因为在善和善的化身中走得太远而遭受惩罚。可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不悦，也没有阻止他们毫无忧虑地继续为善。他们因此而发觉自己离上帝更近，并因此对恶的存在更加深刻地一无所知。

怜悯的孪生物是傲慢（它们像双子塔一样孪生相配）。你为自身的不幸而悲伤，但同时，你又自视非凡。我们得到了非凡的权利是因为从这一刻起，我们是受害者。这是完美的托辞；这是受害者的整个精神保健学，它将所有的罪感一扫而尽，并允许我们把不幸当作信用卡来使用。

美国人缺乏这样的创伤（他们在珍珠港遭遇的是一种战争行动，而不是象征性的攻击）。就一个民族而言，对苦难的理想颠倒最终会伤害它的心灵，以及它在补偿苦难后在一切善的意识上施展权力的自由。科幻小说的开头梦想了一个情境：人们预感到某种黑暗的力量要击垮他

们，但它仅仅在他们的无意识中（或心灵的其他隐秘处）存在。突然，它通过恐怖主义善意的恩典而变成现实了！恶的轴心牵引着美国人的无意识，而之前只是一种幻想和梦想的东西如今通过暴力成为了现实！

它完全源自一个事实：他者，和恶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它完全源自设想他者（朋友或敌人）之根本他性，设想他者不可调解之外在性的不可能。（对他者的）拒绝根植于对自我在道德价值和技术权力中的完全认同。这就是自以为是美国的美国，它睁大了怜悯的眼睛，却毫无他性。

明言之：美国在这里只是一个讽喻，或者是一切权力的普遍形象：无法承受对立的幽灵。除非他者是一个白痴，精神病人或怪胎，否则，他者怎么会想要变得不同，变得不可救药地不同，而没有一丝想要跟随我们普遍之福音的欲望呢？

这便是帝国的傲慢——在博尔赫斯（Borges）的寓言（镜人<sup>2</sup>）中，失败者被流放到了镜子里，他们被迫在镜子里反射征服者的影像。（但有一天他们开始与征服者的形象越离越远，并最终打破了镜子，对帝国发起了又一次的攻击。）

在菲利普·穆雷（Philippe Muray）《亲爱的圣战分子》（Dear Jihadists）的讲话中，也有一个同样的被放逐到镜子中的情形<sup>3</sup>：“我们制造了你，圣战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终将成为相似性的囚徒。你的激进主义是我们传授的。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对一切漠不关心，包括我们自己的价值。你无法杀死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死去。”

你以为你在反抗我们，其实你无意识地站在了我们一边。你已被同

2 In "Fauna of Mirrors", *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Harmandsworth: Penguin, 1974), pp.67-8.

3 Philippe Muray, *Chers djihadistes* (Pairs: Mille et une nuits, 2002).

化。”或者：“你干得不错，但你只是在杀死你自己作为独一性的力量……你以你的行动重新进入了你所诅咒的全球化游戏。”

一份关于我们的正在死亡的文化悲惨本质的宣言，同时也是一份关于任何对文化的暴力反抗的失败，或相信文化正在死亡的失败的宣言。可怜的反叛者，可怜的无辜者！“我们应该击败你，因为我们比你更加死气沉沉！”但这与我们言下所讨论的死亡不同。当西方文化目睹了其全部的价值一个接一个地灭绝后，它就以最糟糕的方式从外部转向了自己。我们的死亡是一种灭绝，是一种毁灭；它不是象征性的赌注。我们的贫乏就在于此。当一种独一性把自身的死亡投入到圆环中时，它就逃避了这种缓慢的灭绝，它自然而然地死去。这是一个赌注翻倍的大游戏。独一性在自杀的同时也让其他人自杀——我们会说，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地让西方“自杀”了。一种为了死亡的死亡，尚无法被象征性的赌注所美化。穆雷说：“我们已经毁掉了我们的世界，你还想要什么？”然而，恰恰是我们已经毁掉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将继续被毁掉。被象征性地毁掉。这根本不是同一个事业。虽然我们已完成了第一步，但只有他人才能够去做第二步。

甚至在复仇和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同样的想象之缺失——同样无能地把他人视为非完全成熟的敌人，同样的魔幻解决方式：消灭他并随意地抹除他。

把伊斯兰教当作恶的化身是在成就它的荣耀（在此过程中也成就了某人自身的荣耀）。但我们无法那样来看清事情：当我们说伊斯兰教是恶的时候，隐含之意是说伊斯兰教不够完美，是令人厌恶的，而它是暴力的是因为它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把自己当作一个被羞辱的受害者，蕴育着自己的不满而不是欢快地到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自身的位置。出

于绝望，伊斯兰教在倒退着，并且奉行原教旨主义。但如果它变得充满敌意，那么，它就必须被降低为无能。简言之，伊斯兰教不是它应该所是的东西。那么，西方又如何？

在如下时刻，也同样会出现沉思的无能，即当这些“狂热分子”可以完全自由地委身，而不会有任何盲目、疯狂或被操控的形式之时。我们掌握着鉴别善恶的垄断权，故而，唯一“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不得和我们的道德律相一致。这就意味着把任何针对我们价值的抵抗与暴力都归为意识的盲目（可这种盲目从何而来？）。“自由和开明”的人必然会选择善，这是我们普遍的偏见——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观念，因为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被指派给他的“理性”选择，他最终就无法再做出自由的选择了（精神分析就擅长对这些“抵抗”做出解释）。

希利滕贝格（Lichtenberg）在这一点上告诉了我们某些更加古怪、更加本原的事情——对自由的恰当使用是滥用，是过度地使用。而这就包括为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及他人的死亡担负起责任。这就是把“懦弱”一词应用于恐怖分子的荒谬所在了：他们因为被选为祭品而懦弱，因为使无辜者牺牲而懦弱（当我们并未指责他们借此之利来换取天堂之门票的时候）。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试图超越无条件地尊重人类生命的道德命令，并且设想我们应该在他人和自己身上尊重一种并非生命并且超过了生命的东西（存在并非一切，存在只是事物微不足道的部分）：一种命运，一种原因，一种自豪或牺牲的形式。一种远远超越了存在与自由的象征性赌注——我们无法承受它的缺失，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人道主义秩序的拜物教价值。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出于完全自主和“意识之自由”的恐怖主义行动。现在，象征性义务下的选择有时变得深深



地神秘起来——在罗曼德（Romand）的例子中，他过着双重的生活，杀死了全家，不是害怕被揭露，而是害怕家人在谎言败露时遭受深刻的失望。<sup>4</sup> 自杀不会把罪从记录上消除；它只是把耻辱转移到他人身上。何处是勇气，何处是懦弱？自由的问题，一个人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不再把它自身强加在道德意识的观念上，而一种更高的自由必定允许我们把它舍弃于滥用，或把它牺牲。奥玛·卡亚姆（Omar Khayyam）说：“宁要一个套着爱之枷锁的自由人，也不要一千个被囚禁的自由俘虏。”

我们看到，这几乎是对统治辩证法的一种颠覆，对主奴关系的一种矛盾的颠倒。在过去，主人被暴露于死亡面前，他可以拿死亡做赌注。奴隶被剥夺了死亡和命运，他注定要生存和劳作。今天，事情又如何？我们，掌握权力的人，逃避着死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完全占据了奴隶的位置；而那些摆布着自身之死亡，不把生存作为特定目标的人们，则象征性地占据了主人的位置。

另一种反对——这一次考虑的不再是动机，而是恐怖主义行动的象征性要旨。在9·11袭击，在对全球化胜利逻辑的暴力挑战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强烈意义上的象征性行动吗（也就是说，它是否表明了一种价值的颠倒和变形）？例如，根据卡洛琳·海里希因（Caroline Heinrich）的说法，在以一个价值体系和更高现实的名义来攻击拟像和非差异的逻辑的行动中，恐怖分子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同一性逻辑。她说：“在对抗非差异逻辑的过程中，恐怖分子试图为某些失去了意义的事物恢复意义。”对我们而言，真实（the Real）就是如此——也就是一种能指的幻象——而恐怖分子是在用从过去挖掘出来的新赌注和新价

4 Emmanuel Carrere, *The Adversary: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Deception*, trans. Linda Coverdale (London: Bloomsbury, 2001).